



无本可据、无所适从的中国学人日益失去学术自信，处于世界学术边缘的欧美汉学反而形成主导中国本土研究之势。

时至今日，中国文史之学的最大隐患即为支离，表现一是“发见”多于发明。今人所见史料，超过近代学者，而读懂史料的能力则远不如之。因而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献本身的解读，从中发现史实及其内在联系，往往以格义法解读文本，并将自以为读懂的部分史实抽出，甚至按图索骥地找材料，附会于现成的解释框架，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于是，清代经学末流的字未识完而微言大义已出之弊变相盛行于近代史学，史实脱离相关语境，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被割裂，格义附会而成的东西愈是自为系统，就愈是肢解真实系统。中国学者方法上不能跟上几经转手的欧美中国学变化的频率幅度，而以后来外在观念断章取义文献，则有过的无不及。二是分解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国社会长期大小传统并存互渗，小传统往往由大传统推演而成，不知其大，焉能识小？社会学人类学方法，受生成系统（无大传统）和方法本身（重调查轻文献）的制约，极易脱离大传统而专就小传统立论。结果，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被人为肢解，精华难以充分展示。这势必导致贬低其发展程度。葛兰言的理论方法，之所以更容易在人类学和神话学范围内产生影响，然后再反作用于汉学，原因在于其方法适用于前者，而与后者不相啻。当年松本信广为葛兰言辩护的依据，是认为葛氏的中国研究与涂尔干派的社会学者对世界各地的蒙昧民族研究结果一致，批评前者必须批评后者，反之，承认后者就必须承认前者。这正是将中国文化与所谓未开民族等同的典型表现。^① 欲救其弊，不仅视野应从四裔转向内部，更重要的是方法须与对象吻合。

第五节 了解之同情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起，上述偏向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国学术，本守中道，清中叶汉宋之争大起，虽有统治者人为作祟，根源还在方法本身。历史以人为中心，其发展包括人的有意识活动与社会有规律运动，欧洲学术因此分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派，相互竞

^① 参见[日]松本信广：《佛兰西に於ける支那研究》，见《支那研究》，388页。

进，却将本来统一的两面割裂。汉宋之争类此，言义理者凿空，谈考据则琐碎。但历史本身是两位一体。清代考据正统，与欧西近代科学主义暗合，反而偏离中国学术传统的大道。晚清各家因而多主调和汉宋。自欧化思潮风行，科学主义大行其道，而考据再兴。1921年梁启超演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于史料的收集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走”^①。后作补编，即突出“广”，强调“大规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风气”。钱穆、蒙文通、张荫麟、萧一山等人批评“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②，指责整理国故“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皮毛，吐弃故籍”，“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③，重提调和汉宋，主张通专并重，以专求通。与此前章炳麟、张尔田等人不同，他们吸取西学的研究和表述新法，与宋儒及清初学者的观念方法融合，实际写出作品。不过，具通识和著通史并非一事，通与不通，分别不在对象而在见识，加上变通经致用为通史致用，形通而实疏，则仍为蔽而不通，因而所获承认有限。梁启超的粗浅博杂，自认不讳。渐居主流的傅斯年等人，对成就较著的钱穆的著述主张也白眼相加。

与此同时，史学二陈有意无意起而矫正时弊。陈垣以其治宗教史的严密转治传统正史政治史。主张用一时代之新材料治一时代之学问以预流的陈寅恪，则宣称平生所知，仍限于禹域之内。所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空论少而发明多，建设多而破坏少”，推究渊源，明述系统，不具成见，实事求是，被评为“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可一洗当时治史者喜称专

^①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专集》，第1册，167~168页。梁启超认为史学家喜欢补残钩沉是受科学的影响，欧洲因大题目已做完，故可以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而中国如一味行此捷径，则史学永无发展。

^② 钱穆致李珣函，转自《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纪念文集》，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此函写于抗日战争期间，其见解却早有表露。1933年2月，钱应邀为罗根泽编著的《古史辨》第4册作序，表面替考据辩护，其实“着眼于中国民族文化之前途，颇有慨于现今大思想家的缺乏”，因而有评论称“这在北平的学术界里充满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之中尤其是对症发药的文字”。朱自清说，“盖钱意调和汉宋，其志甚伟。”（《朱自清日记》，1933年5月19日，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③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载《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

家、不识制度损益演变、多穿凿附会一二事之流弊，为抗战期间公认的佳作。有人因而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称赞二书。^①

在推重宋代学术一点上，陈寅恪与钱穆所见略同。他对钱著《先秦诸子系年》的评价远较时流为高。此书写成不久，顾颉刚代为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列席审查三人中，冯友兰主张改变体裁以便人阅；陈寅恪则认为自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虽因居少数而未获通过，却屡屡对人称道推许此书稿。^②不过，陈、钱二人所指宋代学术又有分别，治学路径也不同。后者重在义理之学即一般所谓宋学，先以史证子治经，继以经驭史，后来更偏于义理一端，形同以史注经，有违“非碎无以立通”以及“义理自故实生”^③的初衷。义理之学，难以目验，功夫不到，见识愈高，愈易逞臆玄谈，似是而非。陈寅恪则推崇宋代学术的总体成就，尤其认为中国长于史学，欧洲长于哲学，且由宋代史学发掘出相应方法，由史见经（礼乐）。^④他特重《资治通鉴》、《通鉴考异》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书，由前者知著史须通古往今来大势，不能仅见于个别史实；其次则明选择取舍史料即由史料见史实真相的方法；后者为治史不仅需了解故实，更需会通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以显现把握民族精神文化。其上溯宋代学术精义所创同情式述论史学，沟通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超越乾嘉考据和域外汉学，解文本以通史实，由史实以明语境，因语

① 参见王育伊、王锺翰所写《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评，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

② 参见钱穆：《师友杂忆》，1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1933年3月4日，陈寅恪在叶公超宴席间谈及“《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论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并且“更可以诋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朱自清日记》）。1934年5月16日，又对来校参加研究生口试的杨树达“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积微翁回忆录》，82页）。钱著初版于1935年12月，陈寅恪显然对于清华不出此书有所不满。对钱穆抗战期间发表的《国史大纲·引言》，陈也认为是篇“大文章”（《师友杂忆》，228页）。

③ 《古史辨》，第4册，钱穆《序言》。

④ 重视宋代学术，虽为当时学者共识，其实分别甚大。陈寅恪极少凭空谈经论理说禅，对先秦思想的想法远较时流为低，对宋学则更多从新儒学的源流立论，而且形容无书可读之苦为“日入禅宗，讲宋元理学，作桐城文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00页），与陈垣所谓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立意相通。虽号称文史兼通，但说文实为治史的手段，如以诗证史以及论古音韵，目的均在求历史的真相。只是所谓真相不仅故实，更重人心。



境而知人心，扬各家之长而抑其弊，且与中国史学特性相合，最宜于匡正中国研究的时弊。

中国历来文献遗留多而且连续一贯，文史之学的特征与特长均受此制约。清代学术详于经史文本而忽略辅料故实，近人矫枉过正，每有脱离文本和正史的趋向。史料为史学基础，所谓发明，即贯通新旧史料，揭示所含之事实、联系与意义。欲通史料文献，须知字义、故实及寓意。就此而论，治史有三重境界，一为从史料外面看，曰望文生义，格义附会。二为从史料里面看，曰信而有征，实事求是。三为从史料上面看，曰虚实互证，了解同情。所谓虚，一是其事不能具体实证，须由相关语境显现；二是所证并非实事，而是社会常情变态及个人心境，由此可从事与情两面把握作为历史活动中心的人。后一境界须处处由第二重演进，最忌凭义理虚空演绎。

近代以来，文献范围大为扩展，地下遗文，域外文书，杂著实物，都入于治学正道，但仍有时间、主次之别。公认于史料最精博的陈寅恪，对此体会极深。他认为上古史料遗留不足，确证不易，反证亦难，加以所受训练主要不在小学，因而一反潮流，自称生平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虽然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解移情，神游古人相同境界之说，实有寓贬于褒之意，而且其本人在史料不足处慎用此法。至于中古史，立论不难，反证亦易，于此一面主治制度文化，注意古人言行与社会生活制度的关系，从条文与实际的差异见社会常情与变态^①；一面以诗文证史，虚实互证，既扩大史料范围，更由事实深入人心^②。

最适宜同情式述论法的还在明清以降的近世和近代。史料愈近

^① 参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1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 钱锺书对于以诗证史颇有异议，这主要由于文史学界域有别，对中国古诗的见解或侧重不同。陈寅恪偏好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前述浦江清关于比兴之论，或即陈寅恪意见。而诗歌另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小序》）者，在白居易看来，如果不能“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则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与元九书》，见顾学颉校注：《白居易集》，第3册，962页）。胡适认为“白香山抹倒一切无所讽喻之诗，殊失之隘”（《胡适留学日记》，74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但陈寅恪重在发明诗中所隐之人事以释史，钱锺书则着力于诗眼文心以谈艺，往往不大留意作者的身世交游，更轻视比兴。考史与欣赏不同，两位“人中之龙”均博览群书，尤好宋以下集部，了解同情古人可谓殊途同归，而解文本的旨趣有别，一重现语境，一直入心境。或据钱锺书之见判定二人学术高下，未免不智。虚实互证，已为清代治经学者见及。杨联陞认为钱著《管锥编》在见其异处再多著笔，可能更富于启发，即基于人事不会完全重合的史家之见。



愈繁，不仅可辨事实真伪，更能洞悉具体语境。近代学者拥挤于古史狭境，忽视晚近历史。或以为轻视考据治古代史固然不行，治近代史尚无大碍，实为谬见。对此陈寅恪的看法前后有所变化。本来他认为近世资料易得，立论不难，只是收集完整不易。但后来研究陈端生，特别是倾全力写作《柳如是别传》，则自称将一生方法尽注于其中，而怅然于无人为之总结张大。由此可见，陈寅恪治学前后凡三变，晚年转向，虽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令其成就达到极致。解析此书，为一专门事业，得失见仁见智。唯前贤本意在于展现方法，而方法大要，与近来所谓“语境”法不无契合，即由前后左右书与前后左右事相互参证发明。其一，将合本子注法由单纯比勘文献进为揭示史实，读通所有相关文献的全部情节含义与了解相关人事的上下左右关系相辅相成。而且联系并非就事论事，须通达古今中外，所谓解一字即一部文化史（欧美汉学家运用类书法之弊，在于脱离具体语境强引前后联系，不免曲解原意）。其二，通晓文献的情节含义和有关人事的语境，则历史人物言行所由生的心境逐渐显露，而文献背后的潜意即作者的思想也将透出纸背。由此可见，虚实往往相对而言，实事未必实意，而实意常无实事直接表现。欲达此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境，至关重要的一是解今典（鲁迅亦称为新典），若纯解古典，则只知字义，不明语境，不免望文生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二是注意具体殊境与社会常情变态的联系和区别，若二者相混，或以后者代前者，则容易流于比附；三是所揭示的人心，与民族文化的一贯精神密切相关，而非一己隐私。^①此法精要，在于读史书与治史事相统一，证有形之事实与显无形之精神相联系，究个别人事与晓民族大义相贯通。

治学无成法，而有定规。此一“灵魂之冒险”事业，“须发心自救”^②。而人的禀赋有别，往往难以兼具专精与博通。梁启超和胡适在大刀阔斧与拿绣花针之间均不免临歧徘徊，余者多随性之所近，各执一端。唯有禀赋特异而天缘巧合者能够既博且精，沟通两面。梁启超曾经感叹“中国学问，本来是由几位天才绝特的人‘妙手偶得’”，不如西方科学能够传承普及。^③一般而言，固然如此，若论学术的高妙境界，则东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学术之兴替，与生理

① 钱穆讲现在心小我心与文化心大群心之别，其实二者亦有联系，往往互见。

② 钱锺书：《与张君晓峰书》，载《国风》，第5卷第1期（1934年7月）。

③ 参见《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见《梁启超文选》下，405页。

之传承异，后来者未必居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大师，往往照远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无法代代相继，更不必说长江后浪，青胜于蓝。其原因不在有人无人，而是那种天才本为不世出，正所谓一线单传，不绝如缕，非人多势众所能弥补。但其所昭示的轨则，悬空而实在，虽时为社会动荡所牵引，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后来者不能不受此无形制约。冈崎文夫在悼念王国维时说，中国学界的新倾向本应以王一派为指导，“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勿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①。其实，除了客观原因，学术本身的性质更具有决定意义。近代中外学术发展变化的轨迹，便是最佳明证。



^① 《悼念王征君》，见《追忆王国维》，370页。